

中共與印度關係的檢討與展望

沈鈞傳

改善關係的各種徵候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印度正式承認中共。一九六二年中共與印度發生邊界衝突，使兩者的關係凍結幾達十五年之久。在這一段期間，蘇聯介入，使印度成爲它孤立中共的重要伙伴；而在同一時期，印度的主要敵國巴基斯坦，由於和中共地理上的接壤，以及共同與印度爲敵，乃逐漸接近，並成爲中共在南亞次大陸的友好國家。

一九六七年後期，印度曾一再公開表示，願意和中共恢復正常的外交關係，可是那時正值「文革」期間，中共的對外活動幾乎陷入停頓狀態，因此對印度的表示未加理會。一九六九年春，中共召開「九大」，宣佈結束「文革」，此時儘管中共與印度關係的實質並未改變，但是形式上出現了許多可能改變的跡象，雙方的外交人員也多所接觸^①。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巴基斯坦總統雅亞訪問北平時，中共頭子曾親自告訴他：印度和中共可能恢復自一九六二年邊界戰爭以來的全面外交關係^②。可是接着印巴兩國之間爲了東巴基斯坦獨立問題，爆發了戰爭，致使中共與印度的關係再度受到凍結。

東巴獨立以後，南亞次大陸的均勢發生了基本的變化，印度雖然獲得軍事上的勝利，但是在第三世界中實已聲名狼藉，而實際上印巴戰爭的真正獲益者是蘇聯。所以中共自一九七二年起一面繼續在政治、經濟和軍事等方面支持巴基斯坦，以穩定布托的領導權，使巴國在南亞仍然發揮制衡印蘇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巴基斯坦的諒解下承認孟加拉國；同時希望改善與印度的關係，設法阻止印度落入蘇俄用以圍堵中共的「亞洲安全體系」圈套。

從一九七二年起，中共和印度都在努力設法使雙方關係逐漸解凍，印度外長辛格（Swaran Singh）曾多次表示，印蘇條約並非以任何第三國爲目標，印度無意參加蘇聯的「亞洲安全體系」；此外辛格還向中共建議，以直接談判來解決雙方的有關問題。同

註① 詳見拙著「印度與毛共關係之演變」，「問題與研究」，十卷九期，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

註② G. W. Chaudhury, "Trend in China: Post-Mao Policy in Asia", *Problem of Communism*, July-August 1977, p. 27.

時中共也做出了許多相應的行動，「副總理」鄧小平曾在歡迎巴基斯坦總理布托的宴會上說過：「我們願意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次大陸各國發展睦鄰關係，進一步增進同次大陸各國人民的傳統友誼」^③，接着印度在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日舉行第一次核子試爆，中立的官方並未立即加以評論，直到印度於八月廿九日公然要吞併錫金，中共官方才公開表示態度，并在一篇題為「強烈譴責印度吞併錫金的可恥行徑」的社論中表示：「最近，它（印度）又搞了一次核爆炸，對南亞地區進行核訛詐和核威脅」；中共還替印度加上「次超級大國」的頭銜，而相反的則自命為反超級大國者；接着該文指出：「印度的這一擴張行徑，是得到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慫恿和支持的」^④，中（共）印關係顯然再形惡化。

到了一九七五年二月，中共「副總理」陳錫聯率團參加尼泊爾國王加冕典禮，其所乘專機在往返北平途中，曾特別經過加爾各答，陳某在機場答覆記者訪問時他表示，如果印度政府希望談判關係正常化問題，我們隨時準備和印度政府舉行會談^⑤，陳錫聯在加爾各答之所以受到各國觀察家的重視，主要是因為這是自一九六二年以來，中共第一架飛機在印境降落，而且這架專機載有足夠的燃料，可以直接往來於昆明與加德滿都之間，沒有必要在加爾各答添加燃料，因此其意義之不尋常也可想而知了。不過到了同年四月廿三日，印度國會正式通過法案合併錫金，使這個希瑪拉雅山下的印度保護國，成為印度的第二十二省^⑥。這一措施，使得中共與印度關係正常化受到阻延。

印度終於採取主動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五日孟加拉發生政變，親印度和蘇聯的總統——孟加拉立國之父——莫吉布·拉曼(S. Mujibur Rahman)慘遭殺害。新政權在對外關係上採不結盟政策，亦即逐漸疏遠印蘇並改善和中共及巴基斯坦的關係。孟國政變半個月之後，中共於八月卅一日正式承認孟國新政府。這一項新的發展，對印度而言，是個莫大的打擊。如果孟國採取親中共政策，那麼印度東部在戰略上將受到直接來自中共的威脅，所以印度總理甘地夫人大為恐慌，並指責外力介入孟加拉政變。自此以後，據非官方的報導，中共與印度軍隊，曾在錫金與拉達克邊界發生軍事衝突，惟據中共方面私下表示，戰鬥的規模雖然不大，但其目的是在勸阻新德里，切勿干涉孟加拉內政^⑦，同年十月二十日，中印邊界東段土倫山口又曾發生流血衝突，造成印軍四人被擊斃的事件，印度指責這一

註③ 「人民日報」，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三日。

註④ 「人民日報」，一九七四年九月三日。

註⑤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26 Feb., 1975.

註⑥ China Post, Taipei, April 24, 1975.

註⑦ Far Eastern Economist Review, October 31, 1975, p. 5.

行動是由中共伏擊印軍所引起，中共於十一月三日的一篇外交部發言人的聲明中駁斥了印度的指控^⑧。由此可見，中共爲了防止印度可能對孟加拉政變採取報復行動，而向印度進行了一連串的恫嚇，以便保障其在次大陸所取得的新利益。

一九七五年孟加拉政變和印度內部的政治危機，可以說是中共和印度關係改善的重要因素。印度總理甘地夫人於一九七六年五月被法院判定非法競選後，國內各反對黨派羣起指責，要求她引咎辭職，全國各地也發生反甘地夫人的羣衆大會，爲了鞏固她的統治地位，甘地夫人乃於六月廿六日宣佈緊急狀態，停止憲法中的人權保障，大肆逮捕反對黨領袖，引起了全國的反甘地夫人政潮，印度政局因此而動亂不已，種下了甘地夫人日後大選失敗的種子。孟加拉政變後採取了反印與反蘇的政策，使中共在南亞獲得新的據點，不僅對印度構成直接的威脅，也使一向受中共支援並訓練的納加和米佐族分歧份子，以及西孟加拉省境內的毛派共黨納薩萊特運動（Naxalites Movement）的所謂非法活動，再度獲得庇護之處，所以甘地夫人在內外交困的情形下，很希望和中共恢復正常的外交關係，只要中共有一點暗示，新德里決不會放過突破僵局的機會。

一九七六年元月十六日，中共「副外長」韓念龍在出席印度駐北平大使館所舉行的國慶酒會上，向印度代辦梅羅特拉（L. L. Mehrotra）表示，兩國外交關係應該升格^⑨，於是非正式的會談，接着進行。至四月十五日，印度外交部長查萬（Y. B. Chavan）向下議院宣佈，印度將派遣資深外交官納拉雅南（K. R. Narayanan）爲駐北平新大使^⑩，中共嗣亦通知印度代辦，同意和印度恢復大使級外交關係的建議。

中共與印度雖然同意恢復大使級外交關係，但是由於長期的敵對，再加上雙方都要顧慮到巴基斯坦和蘇聯的反應，所以全面關係正常化的過程，顯得慎重而緩慢。印度雖曾於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五日採取主動，宣佈派遣新使進駐北平，但納拉雅南遲至七月七日才走馬上任，而且在此期間，印外長查萬曾告國會議員稱，印度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並不影響印蘇關係^⑪；甘地夫人亦曾於五月十一日和十二日分別向伊朗記者團和澳洲坎培拉時報記者表示，中共與印度關係正常化無損於印蘇關係^⑫。此外甘地夫人於七月八日訪問蘇聯，就中共與印度的新關係有所解釋並爭取諒解。由此可以看出，印度在處理與中共關係正常化過程中，態度異常謹慎。

對於印度的主動建議，中共雖然作出了立即的反應，但是其行動却非常遲緩，一直到印度大使抵達北平後，中共才於七月十二日，正式任命陳肇源爲駐新德里新「大使」，而陳某更遲至九月六日，才啓程赴任。此後，雙方的關係迄一九七七年三月印度大選

註⑧ 「人民日報」，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四日。

註⑨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1976, p. 27845.

註⑩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April 16, 1976.

註⑪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May 15, 1976.

註⑫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May 12 & 21, 1976.

，甘地夫人垮台之前，都沒有任何突破性的進展。

中共對印度新政府的幻想

德賽所領導的印度人民黨取代甘地夫人的國大黨政府之後，新政府受到中共的歡迎，但是蘇聯則感到相當困擾，尤其是德賽可能改變對外政策，更使蘇聯感到恐慌。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新華社電訊指稱：「國大黨政府多年來在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支持慫恿下，奉行擴張主義政策，使它不僅在南亞地區而且在國際上陷于孤立。國大黨政府對印度人民實行法西斯鎮壓……」¹³。三月三十日的「人民日報」對印度大選作了如下的評論：「印度政局發生的這個重大變化，將對南亞次大陸和印度洋地區的形勢產生重大的影響」，并說：「這是英·甘地（甘地夫人）的國大黨政府這些年來追隨、投靠蘇修，進行禍國殃民的內外政策因而在國內喪失人心的必然結果。英·甘地政府的下台，對蘇修在南亞的擴張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接着又說：「印度是南亞的一個大國，在亞洲大陸和印度洋地區有着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長期以來，蘇修新沙皇爲了實現其稱霸世界的美夢，竭力拉攏英·甘地政府，企圖把印度納入它反革命全球戰略的軌道」，最後該文特別指出：「印度大選結果不僅宣告了英·甘地政府反動的內外政策的破產，而且也標誌着蘇修在南亞地區擴張計劃的一次嚴重的挫折」¹⁴。中共「主席」華國鋒在祝賀德賽就任的電文中表示：「祝中印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獲得發展」¹⁵，從中共上述官方言論看，毛周死後的中共新政權對印度新政府的反蘇政策抱着很大的幻想，尤其德賽在就職後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稱，印度將執行一個「適當的不結盟外交政策」，又說，印度不會與蘇聯有特別的關係，同時還特別指出，一九七一年的印蘇友好條約「一定不會阻撓我們和其他任何國家的友誼」¹⁶。這些話不僅引起了中共的興趣，而且也受到其他各國的重視。

事實上，印度新政府在對外政策上只是修正了前政府過份依賴蘇聯的傾向，希望在國際社會中採取一項對美蘇中（共）的等距離外交，並沒有而且也不可能完全擺脫蘇聯的影響，尤其新政府要想與中共進一步談判邊界問題，就必須仰仗蘇聯的支持。所以一九七七年四月底蘇聯外長葛羅米柯訪印，簽訂了三項協議，收到了安撫印度新政府的作用，同年十月下旬，德賽總理訪問莫斯科，獲得了新的經濟援助，加強了印蘇的關係。

印度新政府執政將近一年以來，在對外關係上，一方面設法維持和蘇聯的關係，另一方面則力圖改善美印關係，大有恢復尼赫

註¹³ 「人民日報」，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註¹⁴ 「人民日報」，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日。

註¹⁵ 「人民日報」，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註¹⁶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March 25, 1977.

魯時代左右逢源的態勢。至於和中共在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也有了若干進展。首先是印度工商界於一九七七年四月應邀參加了「廣州交易會」；五月十九日印度官方宣佈，印度與中共簽訂了自一九六二年以來的第一次貿易協定，印度將向中共輸出六百噸生膠，以交換中共的鋅、錫和水銀，這筆交易的總值約為一千四百二十萬盧比（一百五十萬美元）^{①⑦}。接着印度輪船公司於六月廿四日在孟買宣佈，七月中旬將恢復雙方的船運服務，初時每月將有一次由孟買經黃埔到上海的定期航運^{①⑧}。六月底至七月初印度一個記者代表團也曾訪問中國大陸。

中共與印度之間的貿易、交通和文化方面的關係儘管已經逐漸展開，但是政治關係却遲遲未見改善，主要的關鍵在於邊界問題。印度總理德賽認為，自一九六二年邊界戰爭以來，中共佔領了印度克什米爾地區所屬的拉達克約一萬四千平方哩的土地，所以他主張，只要中共繼續佔領印度的領土，他將不會採取任何主動來改善雙方關係^{①⑨}。印度外長瓦吉巴伊（A. B. Vajpayee）在八月五日答復議員質詢時也表示：「進一步關係的改善應由中共採取主動」^{②⑩}。印度總理德賽和國防部長拉姆曾於七月二十二日接見逃亡在印的達賴喇嘛，中共於八月五日向印度政府提出了強烈的抗議，認為「印度政府這樣公開地鼓勵和支持西藏叛匪進行反華活動，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為中印關係的改善設置障礙，不能不引起中國人民的關注和憤慨」^{②⑪}，印度外交部並沒有接受中共的抗議^{②⑫}。雙方關係在顯出若干解凍跡象之後，又在彼此相互指控聲中，再度趨於凍結。

經由第三者出面的試探

為了緩和雙方緊張氣氛，印度外長瓦吉巴伊於上年八月間訪問仰光途經東東（Dum Dum）時曾經強調，西藏是中國的一部份^{②⑬}。接着從九月開始，中共方面又做了幾件令印度感到興奮的事情，首先是中共「副總理」李先念在九月間接見美國記者時，曾詳細和他們討論中共與印度的邊界爭執^{②⑭}。其次就是中共「外長」黃華在聯合國發表的演說中，第一次出現沒有攻擊印度與其他次大

註①⑦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May 20, 1977.

註①⑧ 香港大公報，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註①⑨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註①⑩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August 6, 1977.

註①⑪ 香港大公報，一九七七年八月六日。

註①⑫ Hindustan Times, Delhi, August 7, 1977.

註①⑬ 'Discordant Voice',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Dec. 7, 1977.

註①⑭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Sept. 17, 1977.

陸國家的字眼，但是對蘇聯的攻擊則仍然不遺餘力^②。印度方面也表示了前所未有的友好姿態，那就是以教育部長崇德（P. C. Chunder）為首的政府官員曾經參加中共駐新德里「大使館」所舉行的慶祝偽國慶酒會，這是十五年來印度內閣部長出席中共類似集會的第一次。

當美國國務卿范錫和捷克外長邁尼克（Milos Mincic）於上年八、九月間先後訪問中國大陸時，中共曾透過這兩位國際要人，來試探中（共）印關係進一步正常化的問題，據說這種試探已由兩位外長在聯合國大會期間轉告印度外長，而且新德里駐伯爾格萊德大使館，也收到同樣的消息^③。但是印度政府對於中共經由第三者所發出的試探，採取極為審慎的態度。新德里方面認為北平的試探有三點值得懷疑：（一）北京的善意缺乏具體的證明；（二）並沒有從第三者處獲得正式的文件；（三）中共一直沒有採取任何行動^④。因此，十一月一日印外長在向國會諮商委員會所發表的外交政策演說中，談到印度和鄰國關係時說，所謂關係正常化的試探，好像脫了線的風箏，一點也不可靠。他還向議員們提出警告稱，在逐步邁向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切勿期望有任何戲劇性的發展^⑤。在這種非常不信任中共的情況下，德賽總理復於接受日本「讀賣新聞」記者訪問時表示：「在領土問題解決以前，中共與印度之間不可能有完全的諒解，但是我們不希望以戰爭來解決領土問題，我們希望和平解決」；在被問到有關中共與印度關係的前途時，這位總理又說：「一九六二年戰爭的結果，我們的領土被他們佔領，因此他們應該採取下一個步驟，然後我們再做出適當的反應」^⑥。一個星期之後，北平在一項對海外的英語廣播中，直接答復了印度總理的要求，該廣播說，中共將盡一切的力量，來保衛中印邊界^⑦。印度政府對於中共的這一強硬反應，除了表示遺憾外，顯得有點張惶失措，故其外長竟然不顧德賽總理對日本讀賣新聞所發表的強硬言論，而低聲下氣地說，「不論是中共採取主動，或者是印度採取主動，更或者由兩方面同時採取行動，我們必須向關係正常化目標進行」^⑧。從印度總理和外長最近的公開言論來看，印度對中共的立場並不一致，對於中共的反印宣傳也感到憂慮，尤其是中共一面向印度故示友好，以引誘印度與它談判邊界問題（去年底中共駐印度「大使」陳肇源拜訪印度外長，會談有關印度國家貿易公司邀請中共派遣貿易代表團訪問印度事宜，這是印度自人民黨執政以來，第一次有中共官員拜訪瓦吉巴伊外長^⑨，難免會引起一陣讚賞和猜測）；另一方面中共又在邊界問題上向印度頻施壓力，希望印度能有所讓步（從去年九月份起，印度邊防部隊便處於戰爭

註② 「人民日報」，一九七七年九月卅日。

註③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Oct. 6 & 7, 1977.

註④ "Avoiding a Deep Freeze",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Oct. 18, 1977.

註⑤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Nov. 2, 1977.

註⑥ 讀賣新聞，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Nov. 24, 1977.

註⑦ 中國時報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註⑧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Nov. 28, 1977.

註⑨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Jan. 1, 1977.

狀態，因為被中共招募並施以軍事訓練的一支為數六百人的分歧分子，隨時準備潛回印境進行破壞活動^③；中共這種軟硬兼施的伎倆，似已收到相當的效果。

雙方關係的展望

印度和中共雖然在去年四月十五日起同意交換大使，恢復正常的外交關係，半年以來實際上的進展仍然非常緩慢，除了貿易協定和航運協定外，其他方面並沒有任何進一步的改善。尤其是印度執政當局頗熱衷於談判邊界問題，一再公開表示中共在一九六二年戰爭中佔領了印度的領土。可是中共在邊界問題上，一直堅持一九六〇年四月與尼赫魯會談破裂後所持的立場，當時周恩來強調：「在兩國邊界問題經過商談得到解決之後，雙方應該各守實際控制線，不提出領土要求作為先決條件」^④。因此印度新政府想要以領土要求作為雙方關係正常化的條件，恐怕很難獲得任何結果。今後中共與印度的關係仍將局限於貿易、交通與文化交流等方面，而且印度如果對西藏仍然有所貪圖的話，中共對印邊納加和米佐族分歧份子，以及印度共黨的毛派恐怖活動，決不會輕易放鬆。

註③ 「莫斯科華語廣播輯要」，國防部情報局編印，第五六一〇期，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註④ 「人民日報」，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印尼總統選舉前的政局研析

張耀秋

一 前言

印尼憲法雖明定每隔五年須舉行大選，選出「人民協商會議」代表，再由「人協」代表選舉總統及副總統，但在蘇卡諾執政期間，僅曾於一九五五年舉行過首次大選，直到他一九六五年下台，大選未再賡續舉行。蘇哈托於是年「九、卅」政變接管政權後，於一九七一年七月舉行第二屆大選，從此「人協」代表依法產生。而當時臨時政府的總統、副總統亦已名正言順地符合了「立國五原則」中的「民主主義」精神。^①

註① 印尼建國五原則為：(一)信奉全能上帝。(二)人道主義。(三)民族主義。(四)民主主義。(五)社會公平。